

香港史

從鴉片戰爭

到殖民終結

法蘭克·韋爾許 (Frank Welsh) 著

王皖強 黃亞紅 譯



香港史

從鴉片戰爭
到殖民終結

法蘭克・韋爾許 (Frank Welsh) 著

王皖強 黃亞紅 譯

商務印書館

A History of Hong Kong by Frank Welsh

Copyright: © Frank Welsh 1993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onathan Pegg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The Commercial Press (H.K.)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書中文譯文由中央編譯出版社授權使用。

封面照片由鄭寶鴻先生提供。

香港史——從鴉片戰爭到殖民終結

作者：法蘭克·韋爾許 (Frank Welsh)

譯者：王皖強 黃亞紅

責任編輯：黃振威 張宇程

封面設計：楊愛文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發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印刷：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官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樓A室

版次：201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2015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 962 07 5638 2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目 錄

序 / 1

前 言 / 5

第一章 / 兩個帝國

末代王朝	14
學者與士紳	18
東印度公司的崛起	20
不幸的航程	26

第二章 / 鴉片生意

使人快樂的植物	33
多變混亂的程序	39
我此生從未見過鴉片	42
一羣花花公子	47
收入不錯的行當	50
誰想打一場對華戰爭	56

第三章 / 律勞卑勳爵的屈辱

淒涼的墓誌銘	61
第一個提議佔領香港的人	66
別讓煮熟的鴨子飛了	70
最謙卑而順從的僕人	73
蘭斯洛特·顛地衣領之戰	77
鴉片與威士忌	93

第四章 / 不平等條約

保護神	97
瞄準琉璃塔的大炮	108
南京條約	114
兩個帝國的仲裁者	119

第五章 / 貧瘠之島

“女王陛下的領地”	125
砵典乍時代	134
體面而富有的華人	142

第六章 / 戴維斯突襲

馬丁的報告	145
刑罰	151
硫磺、樹脂、啤酒或黑啤酒——還有鴉片	156
廣州城裏的是是非非	164

第七章 / 英法聯軍

名聲不好的房子、枱球廳和小船	172
庸醫寶寧	179
“亞羅”號事件	186

第八章 / 喧囂與騷動

不顧一切的對抗	197
九龍半島	208
殖民地部	213
滙豐銀行	217
非法遊戲	220
親王來訪	225

第九章 / 令人不快的話題

污水與肉刑問題	234
梅毒只能通過接觸傳染	242
總稅務司赫德	247
來訪者的評述	256

第十章 / 香港要塞

捍衛英帝國	260
法國的野心	265
薩金特將軍的大炮	270
瘟疫	275

第十一章 / 香港殖民地的拓展

1895：中日之戰	289
無視法律的惡例	295
秘密社團的“惡棍首領”	307
彌敦爵士的鐵路	313

第十二章 / 香港與中國革命

惡毒的議員	318
愛國的通姦行為	322

第十三章 / 動盪的局勢

冷若冰霜的面孔	342
為甚麼必定會發生對日戰爭？	354
妹仔	360
蹣跚走進 20 世紀	365

第十四章 / 大東亞共榮圈

可恥的默許	370
大難降臨	374
我們現在自由了	381
英帝國被一筆勾銷了	385
英國選民根本不在乎香港	395

第十五章 / 在夾縫中生存

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態度	402
金錢至上	418
毛澤東的變革計劃	423

第十六章 / 黃金時代

麥理浩走馬上任	432
司空見慣的腐敗	444
華人社會	448

第十七章 / 退場

香港的前途	456
直接選舉問題	467
破舊的帝國背包	471
殖民主義的終結	481

尾聲 / 487

參考書目 / 491

譯後記 / 511

序

我第一次對香港產生興趣是在 1970 年。當時，我擔任董事的一家倫敦銀行收購了道亨銀行，道亨銀行是香港一家規模不小的華資銀行，之後我到這個殖民地去了一趟。

不久，我家在 1972 年買下了弗拉斯宅邸，這是從前廣州和香港商人顛地兄弟（蘭斯洛特·顛地和威爾金森·顛地）在威斯特摩蘭建造的一座宅邸。1839 年，中國當局威脅要拘捕蘭斯洛特·顛地，引發了最終導致第一次英中戰爭即第一次鴉片戰爭。這場戰爭通常以“鴉片戰爭”而聞名，結果導致香港被割讓給英國，廣州貿易大多轉移到香港，顛地洋行成為這個新殖民地最有實力的商號之一。弗拉斯宅邸，連同內部保留下來的家具（德拉姆市古爾本吉安東方藝術博物館收藏的中式大牀值得一看），清晰地反映出維多利亞時代早期那些“富商巨賈”的品位。弗拉斯宅邸有一些細節頗為有趣，這些細節表明了顛地洋行有別於其主要競爭對手怡和洋行的特徵。跟詹姆斯·勿地臣與亞歷山大·勿地臣在蘇格蘭高地建造的豪宅相比，弗拉斯宅邸顯得樸實無華，體現了蘭斯洛特·顛地更為嚴謹、較不浮誇的性格。弗拉斯宅邸的一些細部頗有特色，如手繪牆紙、乳白色的室內家具以及精緻的意大利樣式金屬製品。宅邸向公眾開放後，我們在肯德爾市阿伯特霍爾博物館協助下，安排了關於對華貿易沿革的小型展覽。我為這個展覽撰寫了一份簡明指南，這份指南就是本書最早的雛形。

我想在此先做幾點說明。不幸的是，任何關於英中兩國關係的歷史著述大都是片面的和不完整的。之所以說是片面的，原因在於，任何一位準備研究北京的歷史檔案館所藏滿文和中文官方檔案的學者，多半不會注意到 19 世紀英國政治和社會的微妙之處；而且學術界人士在研究這個殖民地歷史中突出的商業問題時，勢必會遇到很多困難。另一方面，若是不懂中文，就不得不依靠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翻譯和節選出來的材料，本書作者就是如此。這樣一來，除了可能存在的其他不足之處，本書的敘述不可避

免地是以英國為中心的。要用一本書的篇幅涵蓋如此宏大的主題，描述一個社會將近兩個世紀的歷史，勢必要做一些乏味的概括，或是選擇一些能夠反映問題的事件。為了避免平淡乏味的概括，我很遺憾地不得不省略許多相關材料，但我相信本書所附的參考書目至少能夠在史料方面提供一些幫助。

香港的時局變化很快，由於寫作與出版之間難免有時間間隔，我無法在本書中對這一間隔時期的時局變遷做出公正的評判。1991年3月到1993年3月的兩年間，香港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超過了英國。不光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其他許多指標上，這個殖民地最終、或許是永久地、而且肯定是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高速度超越了“宗主國”。

政治的發展也很迅速，而且更為令人吃驚。1992年10月，香港總督決定以一種頗為罕見的方式——如果說以前曾經有過的話——運用王室特權。總督憑藉一紙政令，改變了立法局的組織結構，以及立法局與行政局的平衡。這種情形如同一位都鐸王朝君主運用自己的絕對權力改變政府的運作方式。雖然彭定康的動議強調了王室權力的權威性，但這項動議改變了香港憲政的發展方向。本來，憲政改革的方向是立法局民選議員進入行政局。彭定康先生的動議還造成了一個小小的後果，那就是我不得不在結語中修訂我對彭定康到來之前香港憲政體系的描述，以反映這些新變化。

我意識到本書的不足之處，愈加發自內心地感謝那些曾經給予我慷慨幫助的人士。英中友協的蘿拉·里夫金、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的托尼·法林頓、中國國家檔案局局長馮子直，使得我的北京之行成為可能。在北京，我得到了第一歷史檔案館副館長徐藝圃和國家檔案局外事辦副主任沈麗華的幫助。他們慷慨而友好的幫助使我們能夠鑒別一些重要史料，從而對19世紀40年代的英中關係有了全新的理解。劍橋大學圖書館的艾超世承擔了最為艱巨的任務，他準確地把手寫體的中文史料翻譯成英文。在香港，洗玉儀博士和陳劉潔貞博士在好幾個問題上耐心指導我，張榮洋博士和普里西拉·羅伯茨博士不知疲倦地給予我殷情款待，並在從廣州貿易到現代美國歷史的諸多問題上給予我指點。我感謝上述人士，感謝香港大學歷史系的其他教員，尤其是呂元聰博士，他毫無怨言地容忍了我這個不速之客。我還要感謝香港大學校長王赓武教授、副校監阿爾伯特·羅德里格斯爵士、

邁樂文博士、彼得·衛斯理·史密斯博士以及柏立基教育學院的院長和全體職員。在香港，我還要感謝衛奕信勳爵伉儷、翟克誠爵士、姬達爵士、馬世民、胡應湘，尤其要感謝克雷爾·霍林斯沃思和莫里琳·賽賓。奈傑爾·卡梅隆、蘇珊娜·霍伊、阿蘭·伯奇等歷史學家極為友善，他們關於香港的知識遠比我豐富。香港政府新聞處的馬克·平克斯通和 Shirley Wong，香港歷史博物館的丁新豹博士、政府檔案處的劉潤和博士提供了大量寶貴資料。我感謝馬克·亨內克——梅傑、萊斯利·亨內克——梅傑以及菲利浦·沃克爾、瑪麗·沃克爾，他們為我引見了多位香港人士，其中包括劉健儀議員、安格斯·福賽思、畢比·福賽思、彼得·卡爾頓、特麗西亞·卡爾頓。

回顧往事，我意識到，在過去的幾年時間裏，與戈爾·布思勳爵、科林·克羅爵士、約翰·柯爾維爾爵士等睿智而淵博之人的交談，使我受益匪淺，他們關於外交事務和西敏寺的經驗罕有其匹。我還要感謝約翰·佩奇、伊里亞德·肯達爾牧師、約翰·M. 斯各特、D. B. 埃利森、外交與聯邦事務部的 M. J. F. 洛根夫人、羅伯特·麥克斯通、格雷厄姆、Yen Chung、詹姆斯·卡斯爾斯教授、羅利畫廊的喬納森·薩維爾、雪麗·哈澤德（法蘭西斯·斯蒂格馬勒夫人）、喬治·沃格伯、埃利·沃格伯、瑪麗·特恩布林、倫納德·雷納。

英國、香港、法國和美國的一些圖書館工作人員總是耐心地對待我這樣一個毫無經驗又幾乎不懂電腦的研究者。我特別感激給予我很大幫助的香港駐倫敦高級代表約翰·亞克斯利，代表處圖書館、耳舒拉·普萊斯以及國家海洋博物館圖書館盡心盡責的工作人員。我還特別感謝怡和洋行允許我使用他們的檔案資料。

感謝以下人士和機構允許我複製一些說明性資料：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G. H. 克里準將、格林威治國家海洋博物館託管人、香港政府新聞處、大英博物館託管人、倫敦威爾康姆研究所圖書館、香港皇家警隊以及《南華早報》。馬丁·葛列格里畫廊惠允我使用本書（英文版）封面所使用的油畫。

有關中國的著作都會面臨一個難題，這就是中文姓氏的音譯是採用威妥瑪式拼音還是中文拼音，1985 年之前出版的著作通常採用威妥瑪式拼音，中文拼音則是現在最普及的注音方法。讀者接觸到的英文歷史著作，

包括李約瑟博士的巨著《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大多都採用威妥瑪式拼音或是其變種，因此本書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的所有參考資料採取這種拼音系統。另一方面，當代中國人姓名使用中文拼音拼寫。一些特殊的人物姓名，如 Chiang Kai-shek（蔣介石）、Mao Tse-tung（毛澤東），屬於西方新聞界的習慣用法。這樣一種折衷做法既避免了那種“愚蠢的連貫性”，又可以方便編制和查找索引。為保險起見，重要歷史人物用兩種拼音拼寫。

香港的粵語姓名拼寫尤為困難。在其出色的《香港社會的形成》一書的附錄三，陳偉群博士列出了至少 54 種不同的英文姓名拼寫方式。除此之外，有些人士既有教名，又有中文姓名，顯然很難採取一種統一的標準。

另外一個特別容易造成誤解的問題是香港的貨幣單位。銀元是廣州貿易使用的貨幣，香港亦沿用銀元來作為通貨，雖然交易記錄的貨幣單位通常是中國的銀兩。殖民地早期賬目的貨幣單位是英鎊，從 1862 年開始，港幣成為通行的官方貨幣單位，其價值隨白銀價格的漲跌上下浮動。1981 年，港幣與美元掛鉤，匯率是 1 美元兌換 7.80 港元。除非特別指明是美元，否則本書中的“元”均是指港幣。如果需要與英國的情況做比較，有時會把貨幣單位折算成英鎊。

以下一些度量衡也需要說明：

1 兩等於英制度量衡的一又三分之一盎司；

1 畝約為三分之一英畝。

還要指出的是，在本書中，香港政府的二號人物和白廳的殖民地國務大臣通常都是用“Colonial Secretary”（譯者按，中文版分別譯為“輔政司、布政司”和“殖民地大臣”）。

前言

不情願的雙親

香港，這個維多利亞王朝英國與大清中國的“私生子”，自 1842 年首次出現在國際舞台以來，就一直令其創始人煩惱和為難。起初，雙方都不準備承認這個嬰兒。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勳爵認為它是“一個貧瘠之島，永遠不會成為貿易中心”。巴麥尊更傾向於獲取更多的現款，或是更大、更富庶的舟山，為此他馬上解除了負責談判割讓這個荒涼島嶼的全權公使的職務。不過，維多利亞女王倒是因為自己年幼的女兒有可能成為“香港公主”而欣喜不已。至於中國道光皇帝，在英國皇家海軍軍艦上瞄準南京城牆的大炮的威懾下，被迫承認治下的領土喪失了這個彈丸之地，迄今為止他對這個島嶼幾乎一無所知，而且對整個事件困惑不已。在道光看來，這些夷人惟利是圖，獲取土地也非出自長遠之見，“該夷性等羊犬，不值與之計較”。¹

香港從其開埠之日起就與臭名昭著的鴉片走私貿易關係密切，因而聲名狼藉。從那時起直到現在，香港不時給英國帶來麻煩，涉及鴉片、賣淫、賭博、鞭刑、貪污等一系列醜聞，總督、官員、政府部門與僑民不時爆發爭執，時至今日，白廳仍不得不面對這些醜聞和爭執。

對於中國而言，失去這個島嶼自非所願。雖然香港只是這個龐大帝國末端微不足道的一隅，但對於中華帝國的人民和統治者而言，它始終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儘管外國人佔據的另一個更無足輕重的地方——葡萄牙人的澳門居留地，有 400 多年未受觸動，但問題是香港割讓給英國人的方

1 巴麥尊致義律函，1841 年 4 月 21 日 (*Palmerston, Private letter to Charles Elliot 21 April 1841*)。維多利亞女王 1841 年 4 月 13 日函，載維多利亞女王《書信集》(*Queen Victoria, letter of 13 April 1841, Queen Victoria, Letters, vol. I*) 第 261 頁以下。道光皇帝語，見佩里瑟爾：《覺醒的中國：1793-1949》(*R. Pelissier, The Awakening of China 1793-1949*)，第 90 頁。

式令人惱怒不已。香港的割讓直接起因於中國與西方的第一次武裝衝突，中國在這場衝突中決定性地、迅速地敗下陣來。香港割讓之後，外國政府開始日益貪婪地攫取領土和貿易特權，到 19 世紀末，給中國帶來了一連串戰敗、外債和屈辱。圍繞這第一次外來入侵，已經產生了許多神話，香港居民為此背上了沉重的感情負擔。人們認為，既然香港的割讓導致了外國劫掠，那麼 1997 年的回歸則標誌着屈辱的終結。因此，這個殖民地的歷史與中國和西方的關係，以及西方對華態度的演變密不可分地交織在一起。

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被視為不可救藥的邪惡，民主被當成包治一切社會弊病的靈丹妙藥的時代，香港的狀況卻有悖常理。這個直到最近還沒有任何民主機制的殖民地日益繁榮，成為一個生活宜人的樂園。有人預料，這個彈丸之地將在經濟上超過中國（內地）——人口的迅猛增長和不時出現的不當政府阻礙了這個偉大國家的發展。即使是與韓國、台灣（地區）、新加坡等其他“亞洲小龍”相比，香港也毫不遜色。香港在貿易上與上述國家和地區同樣成功，在保護個人自由方面則做得更好。與台灣（地區）和韓國相比，香港相當好地控制了腐敗，在這個不民主的直轄殖民地，沒有民主化的新加坡所施行的種種瑣碎限制（例如，新加坡明令禁止留長髮、嚼口香糖）。

不僅如此，香港比英國更成功。在過去 10 年裏，香港保持了很高的經濟增長率，香港與英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從 1980 年的 10% 上升到 1990 年的超過 85%。實際上，早在 1981 年，香港就在平均壽命等重要指標上超過了英國（男子平均壽命是 72.4 歲對 71.1 歲，女子是 78.1 歲對 77.1 歲）。

將英國管治的香港與美國管理的領地波多黎各作個對比，就能更好地說明問題。波多黎各有 400 萬人口，與香港的 600 萬人接近；自 1898 年以來，波多黎各一直處於美國控制之下，這與英國控制香港絕大部分地區的時間差不多。波多黎各確實有更為民主的制度，那裏的總督和政府均由民選產生，美國僅掌握外交和國防政策的控制權，但在絕大多數方面，香港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嬰兒死亡率在波多黎各為 16%，香港僅有不到 7%（香港的這個指標甚至低於美國的 10%）。今日香港人的平均壽命為 78.3 歲，高於波多黎各的 73 歲（也高於美國的 74 歲）。其他生活水準指數，犯罪率、

學生與教師的比例、新聞報刊數量、非婚生子女、公共交通品質、免費醫療等等，香港也都走在波多黎各的前面，在一些項目上更是大大領先，同時在很多方面超過了美國。例如，據《聯合國人口統計分析》(United Nations Demographic Analyses)、《美國政府報告》(US Government Reports)、香港政府新聞處(Hong Kon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epartment)統計，香港謀殺案發案率為每10萬人1.64次，美國高達7.91次。

今日的香港已找不到多少殖民地的痕跡，而殖民地過去的標記幾乎早已蕩然無存。太平山的山坡下，高聳的摩天大樓遮住了過去殖民地的中心：港督府，類似於一座日式火車站；聖約翰座堂，一座平淡無奇的哥德式殖民地建築；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旗杆屋，以前是駐軍總司令講究的官邸，他曾在此自豪地眺望停泊在港口的那些閃耀着灰色光澤的中國艦隊巡洋艦。如今，從希爾頓酒店的房間和中銀大廈的辦公室，仍可以看到這些帝國時代的遺跡。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軍佔領時期，總督府可笑地按照日式風格進行了重修，包括新建了一座與四周建築不協調的神道教樣式的塔，之後便再也沒有翻修過。聖約翰座堂在同一時期遭到劫掠。旗杆屋是唯一完整保存下來的最古老的建築，如今是收藏和展覽茶具的文物館。皇后像廣場已經找不到維多利亞女王的雕像，那裏僅存的雕像是一位銀行經理的雕像，這與這個商業之都的氛圍完全吻合。英國國旗第一次在這個殖民地升起的地方位於現在的水坑口街，但早已無跡可尋。慶祝英佔香港150周年的動議，因公務員的強烈抗議而不得不作罷。

在香港街道上，除了警員——幾乎全都是華人——之外，看不到任何身着英式制服的人。唯一能夠見到的英國士兵是添馬艦海軍基地入口處的水兵，平時守衛的艦艇充其量是三引擎巡邏艇，除非有其他軍艦來訪。香港也找不到多少經濟帝國主義的痕跡。人們有理由期望政府辦公樓的停車場至少會有一些本地生產的汽車，但那裏只有豐田和其他品牌的日本汽車；高級公務員可以配備平治車，只有港督本人才有一輛勞斯萊斯汽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一些醒目的帝國象徵日漸消失。1950年，英國政府派出相當於兩個滿員師的軍隊警戒中國人民解放軍。1967年，港督府門外聚集了成千上萬示威者，擔任警衛的卻只有孤零零的一名英國士兵。當時，香港依然能夠看出過去一個世紀的模樣：一個窮鄉僻壤的殖民地，

板球場佔據着市中心，阿斯頓·韋伯爵士設計的最高法院大樓守着市中心，背景則是滙豐銀行的藝術裝飾。在碼頭區，新建的文華東方大酒店和香港大會堂在周圍建築物的襯托下顯得鶴立雞羣。在灣仔，警署直接守衛着港口。

時至今日，法院大樓保留下來，現在是立法局和行政局辦公樓，板球場已經不見了，滙豐銀行裏外一新、富麗堂皇的新總部大樓蜷縮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香港的標誌性象徵中銀大廈旁邊。在周邊高聳林立的辦公大樓映襯下，面目全非的文華東方大酒店和老態畢露的香港大會堂顯得十分矮小。圍海造地使灣仔的陸地向前伸展了將近四分之一英里，一座亞洲最高建築正拔地而起。站在九龍眺望，過去維多利亞城的地平線每週都在發生變化，但依然是香港最壯麗的景象，從港口直到太平山霧氣濛濛的山坡，到處聳立着密密麻麻的宏偉建築。

從九龍眺望內陸，可以看見新界那些在 17 年前還幾乎不存在的新城鎮，荃灣和屯門的居民區居住着大約 30 萬人。今天，有 200 多萬人生活在各個新城鎮，明亮清潔、便捷高效的地鐵和現代化鐵路把這些新城鎮連接起來。老社區依然保留了高層住宅羣，沙田已經成為最大的居民區，擁有兩所大學、一座新建的跑馬場、一家音樂廳以及一個 50 萬人口城鎮所能擁有的各種便利設施。

站在地平線上遠眺，香港就像一個更加多姿多彩的曼哈頓，若是在街道上四望，香港顯然是一座中國城市。即使是西方遊客和商人密集的中環以及新興城鎮——那裏很少有大幅的塗鴉，像廣州或上海一樣來往的人羣中仍多為中國人。然而，香港的人口來自天南海北。除大眾已經接受的印度人和葡萄牙人社區之外，香港人口主要是廣東人，還有 50 萬人從中國內地來到這個英屬殖民地尋求安全與財富（中國大陸地區對香港的狀況頗為自豪）。中國內地山東或四川的農民遊覽北京後，會帶回去一些印有香港奇異風光和北京天壇的明信片。不過，他們只能憑想像去領略各種不同文化奇特融合所產生的時尚、活力與熱情。只有親身體驗香港的生活，深入到街道上全神貫注、行色匆匆的人流中，到各個企業的辦公室——正是這些企業使得香港成為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才能真正感受這種時尚、活力與熱情。

要想說明香港的發展，必須結合過去兩個世紀以來英國、歐洲大陸和中國的政治史，因為其他地方發生的事件決定性地影響着香港的發展進程。當代中國學者在分析他們國家的這一段敏感歷史時期時面臨很多困難。共產黨中國在過去 15 年來取得的成就²，尤其是與以前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混亂相比，已經激發起一種一直潛伏着的沙文主義。質疑政權的那些人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命運，阻礙了人們流露出批評的傾向。直到最近，人們才能夠表達一些立場不那麼鮮明的觀點，而其他嚴肅歷史學家依然把嚴格遵循事實指責為“歷史研究中不可取的實用主義”。³ 國家掌握的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著作，通常從帝國主義剝削的角度來分析這個歷史時期。

中國的確遭受了最無情的剝削，但那是在 19 世紀晚期，而且最窮兇極惡的剝削者不是歐洲列強，而是中國過去的藩國日本。英國攫取香港的時候，並不是一個法國或德國式的擴張主義強國。在這個殖民地的形成年代，英國的輿論和政策正處於發展階段，西敏寺的政府更迭頻繁，還時常伴隨着黨派重組，托利黨發展成保守黨，輝格黨發展成自由黨。英國歷屆政府總是與大多數階層的公共輿論唱反調，經常不贊成他們在中國的代表所採取的行動，並且無一例外地更關注決定大選成敗的國內事務而不是殖民地問題。直到 19 世紀末，英國公眾輿論才變得比較好戰，對殖民戰爭表現出一定的熱情。即使是這種支持殖民戰爭的傾向，也因帝國軍隊在波耳戰爭中的惡劣表現和自由黨重新執政之後迅速削弱。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外交部許多高層人士把香港視為與中國發展良好關係的障礙，極力要求把這個殖民地歸還給中國，這樣一種觀點從來就沒有徹底銷聲匿跡。

共產黨衛道士的分析總是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而非事實本身。例如，蘇聯科學院院士 S. L. 齊赫文斯基在其主編的《中國現代史》（1972 年）一書中提出：“1840 年 1 月，維多利亞女王在議會開幕的施政綱領演說中宣佈，英國政府贊同查理·義律上校及在華英國商人的行動。在得到女王的認可後，巴麥尊勳爵毫不猶豫地發動了對華戰爭。”事實上，當時每一個人都對英國在華代表義律不滿，尤其是那些認為義律屈服於中國人威脅的商人們。

2 本書寫於 1993 年，此處的時間指改革開放的 1978 年以來的 15 年。——譯註

3 賈慶國的論文出色地分析了中國學者在決定“首先是作為一個中國人還是一位學者”問題上的困境。賈慶國：《理智與情感之間》，載羅伯茨：《1900 年以來的中美關係》（Jia Qingguo, 'Between Sentiment and Reason', in Robert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00*）。

那種認為巴麥尊在年僅 21 歲的女王——當時她仍怯生生地緊緊抓住首相梅爾本勳爵燕尾服的下擺——同意之前一直猶豫不決的觀點，更是荒謬的。

只有拋棄這一類錯誤看法，描述英國發生的種種政治事件，才能清楚說明香港的發展。以 1834 年的律勞卑使團為例，這個使團未能在英中兩國之間達成合理的貿易協議。這個不幸的事件首先要歸咎於律勞卑勳爵本人莫名其妙的傲慢自大，本來絕不應該挑選他這樣一個人來擔負如此敏感的使命。香港或中國的歷史學家從未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英國政府為甚麼會挑選一個如此不適合的人選來執行這項任務？答案其實很簡單，議會艱難通過 1832 年《議會改革法案》的過程中，律勞卑幫了格雷勳爵的輝格黨政府，為了償還這筆人情債，格雷勳爵的輝格黨政府把這個差使送給了律勞卑，而律勞卑恰恰自認有資格獲得這樣一個職位。

再比如約翰·寶寧爵士，他肯定算得上是這個殖民地歷任總督中最卓越的一位。“庸醫寶寧”——這是巴麥尊對他的稱呼——是一位激進的下議院議員、傑瑞米·邊沁最親密的朋友和遺囑執行人、編輯、間諜（法國人這麼認為）、鋼鐵製造商、金融專家、聖歌作者，還是俄語、匈牙利語和西班牙語翻譯家。1854 年，寶寧出任香港總督和派駐中國與印度支那的英國代表，正是這位前和平協會的主席突然引發了第二次英中戰爭。⁴ 這次戰爭的結局對於整個亞洲的未來都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但是，從來沒有人試圖解釋，這位沒有半點東方乃至殖民地經驗的地道歐洲人是如何成為這些重大事件的主要發動者的。寶寧與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爵士強行開啟戰端的陰謀，其細節也尚待進一步揭示。

同樣，英國政府在 1898 年為甚麼僅僅要求新界 99 年的租借期，而不是完全所有權？

本書第三、第七和第十一章將詳細解釋箇中緣由。簡單的回答就是：英國政府反覆無常的政策、英國內閣大臣的個性、長期形成的報答政黨忠實支持者的需要，以及國際競爭對手所施加的壓力。要理解上述種種因素的影響，惟有把它們放入英國和歐洲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

4 即第二次鴉片戰爭。